



李诗咀华

李白诗名篇赏析

安 旗 薛天纬 阎 琦



I222.742

132

3

--	--	--	--

李诗咀华

李白诗名篇赏析

安 旗 薛天纬 阎 琦



月文艺出版社

B 124097

--	--	--	--

李 诗 咀 华

——李白诗名篇赏析

安 旗 薛天纬 阎 琦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70,000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300

书号：10326·41 定价：1.45元

李白的生平和他的诗歌

李白，字太白。生于唐代武后长安元年（701）。关于他的出生地迄今尚有二说：一说生于蜀，一说生于碎叶。但无论主张哪一种说法，都一致认为唐代的剑南道绵州昌明县清廉乡（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是他的故里。

李白的少年时代正当“开元之治”前期。当时，唐玄宗励精图治，使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特别是当时朝廷号称“广开才路”，给人们带来很大希望。李白正是在“开元之治”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他在十五岁前后，已写有诗赋多首，同时又学会了击剑，喜欢任侠，还接受了道教神仙之说的影响。十八岁时，他曾到绵州邻近的梓州，从赵蕤学习纵横术。开元八年（720），礼部尚书苏颋出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长史，二十岁的李白带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访他，得到他的称赞和鼓励。开元十二年（724），李白二十四岁，以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临行，有《别匡山》诗一首。诗的最后写道：“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李白从少年时代起就胸怀大志，决心将他的文才武艺奉献给大唐王朝，甚至梦想以布衣直至

卿相，辅佐天子济苍生，安社稷。

开元十三年（725）春，李白二十五岁，经由长江三峡出蜀。沿途作有《登峨眉山》、《峨眉山月歌》、《渡荆门送别》等诗。

李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遇见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字子微）。司马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有感于此言，因作《大鹏赋》。《大鹏赋》是借庄子《逍遥游》中的神话写大鹏翱翔宇宙的情形以自喻，实际上这篇作品还反映了在“开元之治”鼓舞下，唐代士人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

然后，李白就顺长江而下，东游金陵和扬州。当时，李白风华正茂，裘马轻肥，轻财好施，广事交游。他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回忆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散金数目，或有夸大，然李白性格于此可见一斑。此期作品有《杨叛儿》、《白紵词》、《长干行》、《金陵酒肆送别》等诗。

开元十五年（727），李白二十七岁，西游安州（今湖北安陆）。故相许圉师家妻以孙女，从此以后，便以安陆为家。他一方面在北寿山中读书写作，一方面从事干谒活动，积极寻求政治出路。尝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有句云：“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这意思是说，他希望象管仲和晏婴辅佐齐桓公和齐景公那样，帮助唐玄宗治理国家，然后又象范蠡和张良那样，功成身退，回到他酷爱的大自然中。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三十岁。自去蜀以来,“遍干诸侯”,未遇知己,因有“南徙莫从,北游失路”的感慨。他本来寄希望于安州长史裴某,但却遭人谗毁,致为裴某所拒。李白乃作《上安州裴长史书》表白心迹,并在书末写道:“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以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他以为在地方上找不到出路,去到京师长安一定有办法,王公大人都会待他如上宾。李白遂于是年春第一次入长安。

至长安后,虽“历抵卿相”,仍然有志难酬,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因心中苦闷,遂与长安市井少年浪游。浪游期间又误与“五陵豪”(实为长安恶少)交往,几入歧途,险遭毒手。李白大失所望,终于败兴而返。此期诗作有《玉真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长相思》、《行路难》、《蜀道难》等。这一批诗歌在李白一生创作中形成第一个高潮,《蜀道难》就是这个高潮的洪峰。它们都是反映李白一入长安的遭遇和思想感情的作品。不过有的是直抒胸臆,有的是比兴言志。《蜀道难》就是以蜀道艰难借喻仕途坎坷,感慨报国无路的杰作。

李白离开长安以后,因无颜回安陆,乃泛黄河而下,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及宋州(今河南商丘)一带漫游,作有《梁园吟》一诗。继游嵩山,复至洛阳。醉宿龙门,作有《梁甫吟》一诗。这两首诗也都反映了一入长安遭遇失败的情绪,但仍对将来抱有希望,因此诗中一方面自悲自叹,一方面又自慰自解。

开元二十二年(734),李白三十四岁,为了寻求出路,

又出游襄阳，拜访了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韩朝宗。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就是在这时作的。书中介绍了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抱负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才能。希望韩朝宗能帮助他“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但是没有结果。李白以韩朝宗徒有口碑，因作《襄阳歌》以抒愤懑。

开元二十三年(735)，李白三十五岁，应友人元演之邀，北游太原及雁门，第二年才返回河南。与友人元丹丘和岑勋在嵩山南麓的颍阳山居置酒高会。《将进酒》即作于此时。诗中感慨盛年易逝，功业未立，但仍寄希望于将来。

大概是由于许氏夫人逝世，安陆难以立足，李白在开元末叶，携子女移居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

天宝元年(742)，李白四十二岁。秋八月，奉诏入京，这是他第二次入长安。李白虽半生干谒不遂，但这时已名播海内，故为天子所知。但当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从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告成功于天地以后，就志满意得；从开元二十四年罢去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以后，更是骄奢淫逸之心与日俱增；到了天宝初年，他已经变成一个“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安乐天子。因此他召李白进京，并不是为了任用贤才治理国家，而是需要一个出色的文人侍候他吃喝玩乐，点缀太平岁月。李白却以为他多年的政治理想即将实现，因此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于是兴冲冲地奉诏入京。

李白与秘书监贺知章相遇于紫极宫。贺知章对《蜀道难》等诗十分赞赏，并称李白为“谪仙人”。

玄宗召见李白于金銮殿，并命他待诏翰林。李白待诏翰

林期间，多陪侍从之游，时有应制之作。初尚引以为荣，后知玄宗不过把他看作文学弄臣，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每称东山”。又尝与贺知章等人为“酒中八仙”之游。杜甫《酒中八仙歌》有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由此看来，李白或有借酒装疯，拒绝奉诏之事。又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于李白在待诏翰林期间“戏万乘如僚友，视侍列如草芥”，恃才傲物，遂遭谗谤。自知不为朝廷所容，乃于天宝三载(744)春上书请“还山”。玄宗亦以其“非廊庙器”，赐金放还。

李白离开长安时，赋诗多首，或吟鸛鵒，或悲流水，或怀古人，或哀弃妇，都是借以挥斥幽愤的。

这年五月，李白与杜甫初会于洛阳。秋，与杜甫、高适同游梁、宋(即今开封、商丘一带)。次年春夏，又与杜甫、高适会于鲁郡(今山东兖州)。

由于内心的极度痛苦和愤慨，李白决意遁入方外，在这一年的十月，从高天师受道籙于济南郡紫极宫。返任城后，又构酒楼一座，日夜沉饮其上，少有醒时。

天宝五载(746)，李白有越中之行。行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清陈沆《诗比兴笺》云：“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深得此诗之旨。此诗一如《蜀道难》，也是用比兴手法挥斥幽愤之作。《蜀道难》是借蜀道艰险写其一入长安报国无路的遭遇；此诗则是借梦游仙山写其二入长安“攀龙堕天”的经历。故卒章显其志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天宝六载(747)，李林甫使酷吏杖杀北海太守李邕，刑

部尚书裴敦复亦同时遇害。河西陇右等四镇节度使王忠嗣，谏阻玄宗穷兵黩武，竟以“阻挠军功”获罪致贬，旋即抑郁而死。李白在金陵闻讯，不胜悲愤，初赋《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以刺其事，后又作《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大抒愤懑。此诗不仅为怀才不遇之士鸣不平，亦为无辜受害之一代忠良不平。其情绪之激烈，笔锋之犀利，不仅在李集中首屈一指，即在历代作品中也属罕见。

此期诗歌如《战城南》、《登高丘而望远海》以及古风多首，多为抒发愤懑，讥评朝政之作。但亦时有恋阙之情，如《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中有句云：“容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又如《送族兄沈之秦》中有句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正如《拟古十二首其十二》所云：“去去复去去，辞君复忆君。”李白大半生均处于此种矛盾和痛苦之中。

李白此期生活，更加狂放不羁。尝与友人自金陵逆流而上达天门山，穿宫锦袍坐舟中，笑傲自若，旁若无人。又尝与酒客玩月城西，泛舟秦淮，酣饮歌吹，历时两夜一日。

天宝九载(750)，李白五十岁。深感从政无望，始欲以诗文为其终身事业。作《古风·大雅久不作》等诗以明志，隐以孔子作《春秋》自比。

天宝十载(751)秋，李白在南阳石门山中元丹丘处作客，颇有出世之意。忽又寄诗与幽州(今河北北部地区)节度使幕府判官何昌浩，诗中有句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意欲弃文就武，从军赴边。秋末，遂有幽州之行。这时，安禄山已身兼三镇，日益跋扈。但其势虽盛而逆谋未露，所以李白未知就里，尚欲借之

以建立功业。临行，其妻宗氏以幽州为龙潭虎穴之地，竭力劝阻，李白因作《公无渡河》一诗。但为“沙漠收奇勋”的幻想和热忱所驱使，终究冒险前往。没过多久，李白目睹塞垣真象，知安禄山果有作乱之心，就毅然南返。后作《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有句云：“十月到幽州，戈铤如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就是指的此次幽州之行。

李白心知大乱将起，意欲向朝廷建言。但因安禄山深得玄宗宠信，反映塞垣真相的，不但无尺寸之功，反而有杀身之祸。李白忧心如焚，无计可施，只有高举远引，以避祸乱，因而有宣州（今皖南一带）之行。临行，系念君国，感慨万端，乃作《远别离》，借舜与二妃之事，抒去留两难之情。南下渡江，触景生情，又作《横江词六首》，借横江风波之险，寄来日大难之思。

天宝十二载（753）秋，李白在宣城与族叔侍御史李华同登谢朓楼。又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题从《文苑英华》），亦忧世之作。此后三载，漫游宣州各县，往来金陵、扬州，唯以游山玩水、采药炼丹为事。貌似悠闲，实则内心愁苦不堪，故在《秋浦歌》中有“白发三千丈”之叹。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乱作。由于官军一触即溃，战火迅速蔓延及河北、河南。第二年正月，东都洛阳亦陷敌手。李白携宗氏仓皇南奔，开始欲往越中避难，继而又西入庐山。他空怀救国之心，苦于无用武之地，常常辗转不寐，中夜起叹。此期有诗作多首，都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奔蜀。七月，玄宗至汉中，采纳房琯建议，以太子李亨为天下

兵马大元帅，以诸王分领诸道节度使，并遣永王璘出镇江陵。时李亨已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改元至德，以玄宗为太上皇。李璘势力渐张，李亨恐怕李璘威胁到自己的帝位，命令李璘还蜀，璘不从命。十二月，李璘出兵，沿江而下，三次派人聘请李白入幕，李白遂入永王军中。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有句云：“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又有句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可见李白从璘本为“救河南”、“静胡沙”。不料，未及一月，李亨、李璘之间矛盾竟演成内战。李璘败亡，李白竟以“附逆作乱”罪名入狱。幸得江南宣慰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为李白清雪，宋若思释放李白后，并上书荐白可用。但肃宗不但不用李白，反而判处他长流夜郎。

李白由寻阳启程，溯江西上。在流放途中，作诗多首，颇有怨望之辞。

肃宗至德二载(759)，李白五十九岁。春，行至奉节，朝廷以天旱赦免罪犯，李白遇赦获释，立返江陵。《早发白帝城》一诗即作于此时。他以为两京收复，中兴在望，又有用世之意。还至江夏，广事干谒。有《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天马歌》等诗，均为表白心迹，求人引荐之作。结果又告失败。此期诗中所谓“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划却君山”，“平铺湘水”等语，都是借以抒发心中不平之意的。

肃宗上元元年(760)，李白六十岁，还至豫章(时宗氏寓此)，再登庐山，作《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此诗乃借用“楚狂接舆”之事，暗示朝廷昏暗，从政危险，不如游仙学道，以度残年。

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复游金陵。闻贼势复

炽，太尉李光弼出镇临淮，将北上讨贼。李白又欲立功报国，遂请缨入幕，因病半途而返。冬，往依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次年春，病稍痊可，复游宣城。这时，江淮大饥，民不聊生，李白感赋《夜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秋返当涂，沉疴日亟，自知无望，而李阳冰又将辞官归隐，李白竟至无处可去。《笑矣乎》、《悲来乎》，或作于此时。二诗情多反复，语无伦次，颇似悲愤至极、精神失常之作。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李白六十二岁，十一月，死于当涂。有绝命诗《临终歌》一首，诗中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关于李白之死，亦有二说，一说死于“腐胁疾”，一说醉后入水捉月而死。

综观李白一生，可以看出，他从青年时代起，直到逝世之前，都在为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而奋斗。虽然历尽坎坷，屡遭打击，他的雄心壮志，总不销歇。他在屡次受挫以后，尽管亦时作出世之语，但往往其言愈冷，其心愈热，为时不久，便又热血沸腾。终其一生，为苍生社稷之心，无时或忘。正是在这种追求和奋斗中，他虽然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却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二

李白一生为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奋斗不息，这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的根本特征。

凡是认真研读李集的人都不能不为他那种九死不悔的报国热情所感动。固然，李诗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写“我”，但正

因为这个“我”浸透了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因此发而为诗，自然便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自然便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在李白诗歌中，抒个人之情，抒人民之情，抒时代之情，之所以结合得那样自然，那样成功，其秘密就在这里。

通观李集还可以发现，李白笔下的波澜，胸中的激情，一生的经历，同盛唐时期的国运，简直是息息相关，如影随形。

当“开元之治”前期，唐玄宗励精图治，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之际，李白也恰是风华正茂的少年。当他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展现在他眼前的人生道路，似乎是无限宽广，而又充满了阳光。因此，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便呈现出一派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景象。诗中很少感慨，更无牢骚，即使是抒写离情别绪，也使人心旷神怡。

开元中期，唐玄宗东封泰山，告成功于天地之后，骄侈之心日长，图治之心日消，广开才路的诏令也就日益沦为虚文。这一时期，李白“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仍一筹莫展，也就对唐王朝开始感到失望。生活中的坎坷，化为胸中块垒，再现为笔底波澜，诗中的感慨便多了起来。但“开元之治”还在闪闪发光，李白也还在盛年，虽遭失败，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尚未丧失信心，因此他在失望之余，仍寄希望于将来。这一时期的诗作便呈现出明暗交错，悲欢杂糅的特点。例如《梁园吟》中，在慷慨怀古之际，正不胜悲哀：“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忽然又满怀豪情，满怀希望：“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又如《梁甫吟》中，“梁甫吟，声正悲。”分明正在悲歌

慷慨，感叹没有出路，紧接着又自我排遣，自我安慰：“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峍峢当安之。”虽悲不遇，但总以为是时机未至，还觉得来日方长，因此在愤懑之余仍出现乐观的调子；在牢骚之外，也颇有些旷达的笔墨。

到了天宝年间，唐玄宗溺于声色，朝廷上奸佞当道，整个社会已是阴影重重。李白第二次入长安，只落得挥泪出朝，甚至被迫遁入方外。十年间流落江湖，历尽坎坷，备尝酸楚，灰心至极，伤心透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作，牢骚特多，愤懑特盛，对朝政不仅时有讥刺，甚至给以猛烈抨击；且时兴弃世之念，屡作游仙之语。虽然其间不无恋阙之情，但毕竟不复有东山再起的信心，用李白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十年罢西笑”。此期频频出现在他诗中的就是这样的调子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特别是天宝十二载，幽州之行归来以后，深知大厦将倾，痛感祸在眉睫。在一系列诗作中，多次预言叛乱将起，甚至在《郑客西入关》（“古风”三十一）《殷后乱天纪》（“古风”五十一）中，用殷纣王、楚怀王、秦始皇的末日，暗示唐玄宗的末日，自己也决意高举远引。显然，他对唐王朝和自己的前途已是濒于绝望了。

李白晚年的一些作品中，又曾出现过希望的闪光。那是“安史之乱”后期，长安、洛阳两京收复，李白也从流放途中遇赦回到江夏。他以为“天地再新”，朝廷也许还会用他。因此又给这个赠诗，给那个上书，请求引荐。如《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又如《赠升州王使君忠臣》诗：“应须救赵策，未肯弃侯嬴。”又如《赠崔谔议》诗：“希

君一剪拂，就可骑中衢。”诸如此类的幻想，虽然闪烁了一阵，但在寒冷的空气中很快就熄灭了。一个流刑释放犯，朝廷怎么会起用他呢？又有谁愿意推荐他呢？他的请求毫无结果，甚至只不过自取其辱。于是他又决心学道求仙，浪迹江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贫病交加，十分潦倒。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重又出现希望的闪光，也毕竟今非昔比，而且总是带着劫后的创痛和暮年的困顿。例如“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江夏赠韦南陵冰》）又如“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乐酣秉烛游。谢尚自能鸚鵡舞，相如免脱鵝鵝裘”。（《对雪醉后赠王历阳》）假如说，李白在开元时期的作品，即使是抒愤懑，发牢骚，也仍然充满了乐观情绪和青春的活力，那么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则是：即使寻欢作乐，也使人感到他不过是在强颜为欢，甚至是狂歌当哭罢了。

盛唐的现实生活在李白诗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李白的诗堪称是“时代的镜子”，其反映时代的广度和深度在历代诗人中是少有其匹的。

过去，人们常爱称他为“诗仙”，又有人称他为“颓废诗人”，以为他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苍生社稷曾不系其心膂”等等，这实在是严重的误解，和李白的实际可谓相去万里。

李白其人及其诗，长期未获充分评价，甚至遭到误解，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最大原因恐怕是对他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缺乏认识。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是欧洲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社会产物。但作为创作方法，它却是和文学艺术同时产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源远流长，并峙千秋。在反映现实这一根本点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同样都能深入地反映现实。两者的佳作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产物。但是它们各有特点：现实主义侧重“外师造化”，即侧重客观事物的描绘；浪漫主义则侧重“中得心源”，即侧重主观感情的抒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大流派，正是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法，在艺术领域中形成“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景象。忽略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就等于求鱼于天，求鸢于水，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浪漫主义由于侧重主观感情的抒发，而感情，特别是某些深刻而又复杂的感情，往往很难直接表现，这就常常需要借助于一些与之相适应的事物来曲尽其意，而诗人心中郁积的思想感情在自然界中总是可以找到与之相适应的事物的。于是一触即发，发而为诗。故沈德潜《说诗碎语》有云：“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意深也。”所以，浪漫主义常常运用比兴手法。

运用比兴手法是李白诗歌(特别是乐府诗)的一大特点。

李阳冰《草堂集序》谓李白诗：“凡所著述，言多讽兴。”

胡震亨《李诗通》谓李白乐府诗：“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所未有。”

魏源《诗比兴笺》序云：“阮籍、傅咸、鲍明远、陶渊明、江文通、陈子昂、李太白、韩昌黎，皆以比兴为乐府。”

李白自己也曾在《幽涧泉》一诗中透露过他的比兴言志的特点：

拂彼白石，弹吾素琴。幽涧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张清。
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飕兮万寻。中见愁猿吊影而危处兮，叫秋木
而长吟。客有哀时失志而听者，泪淋漓以沾襟。乃缉商缀羽，潺
湲成音。吾但写声发情于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涧泉，鸣
深林。

在这首诗中，李白表面上是写弹琴，实际上是指作诗，特别是指古风和乐府的创作。可以说这是李白天古风和乐府的自我介绍：它们好象是古乐府中的琴曲，使人听见深山幽谷中的流泉哗然长鸣，还伴随着阵阵松风和声声猿啼。有谁来欣赏这种曲子呢？凡是忧国忧民之士，天涯沦落之人，他们听了以后自然会感动得流下泪来。最后诗人特意写道，我不过是借琴声抒发我内心的感情，却不知道我弹的曲调是古还是今。明眼人一看便知，李白是在暗示他的诗歌创作借古讽今的秘密和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

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有云：“吁嗟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苍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文中的“挥斥幽愤”四字，可以说，概括了李白一系列代表作的秘密。由此可见，他写名山大川，写风花雪月，写英雄美人，甚至写神仙幻境……这些事物在他的诗歌中常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写它们主要是借之以“挥斥幽愤”。

李白在诗歌中之所以有这样多的“幽愤”要“挥斥”，正因为他经历了丰富而又坎坷的人生。这些“幽愤”，正是他坎坷